

儒林外史

吴敬梓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敬梓著

儒林外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
北京

儒 林 外 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0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0 $\frac{1}{2}$ 插页 2

1977年1月北京第1版

197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453

定价 1.40 元

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它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象，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程朱理学和孔孟之徒的反动、虚伪，具有鲜明的反儒倾向。鲁迅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撻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这是对《儒林外史》进步思想内容和讽刺艺术的最好概括。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吴敬梓出生在清代康熙年间，主要活动在雍正、乾隆两朝。那时候，清王朝正由盛转衰，延续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日益临近最后崩溃，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广大农民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下，失去了土地，“家无担石，不厌糟糠者，十室而九”（《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被迫走上反抗道路，一场农民革命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由手工业工人、作坊主、中小商人等组成的市民阶层，同样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打击和迫害；在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南方城市，多次出现了手工业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风潮。统治阶级内部也日趋瓦解，少数思想上比较先进的人物，已经开始认识到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统治。

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强烈地表现出来。当时，尊儒和反儒的斗争，拥护还是反对程朱理学的斗争十分激烈。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外强中干的反动统治，更加狂热地乞灵于腐朽反动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全盘继承了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雍正刚上台，就吹捧孔丘“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师”（《东华录》雍正元年二月）。乾隆曾令学士方苞选批八股时文，定名为《钦定四书文》，“颁行天下，以为举业指南”；并胡说儒学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南巡盛典》卷六十七《祀典》）。他们进一步把程朱理学确立为官方哲学，根据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规定科举考试专考经义，文章内容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格式是八股文。这样，就使一般读书人都“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认为“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编三《答沈枫樾论学》）。另一方面，清统治者采取高压手段，大兴文字狱。雍正、乾隆时，株连广泛的文字狱，总数不下七、八十起。封建统治者用镇压和诱骗的反革命两手，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妄图遏制和消灭一切反抗意识，把新的思想萌芽扼杀在摇篮之中。

但是，黑暗的思想统治不可能掩盖掉进步思潮的光辉和影响。明末清初，先后出现了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宋明以来反动统治者御用的正统儒学——程

朱理学。针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谋道不谋食”等阻碍社会发展、遏制资本主义萌芽的反动教条，在经济上，黄宗羲、唐甄等提出“工商皆本”的进步主张；在思想上，王夫之提出“欲即天理”、“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颜元尖锐地指责理学家的谬论，是使“天下不惟不利，且将无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将无生。”稍后的戴震更一语破的，斥责程朱理学就是“以理杀人”。这股进步思潮的锋芒所向，已经触及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黄宗羲大胆地说出了这样的富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言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对于八股科举考试，这些思想家大都采取比较坚决的否定态度。他们勇敢地抨击八股制义毒害人心，摧残人材，助长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明末清初这个进步思潮，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给吴敬梓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称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出身在“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辈在明、清两代都是达官显宦，但吴敬梓一支，从他祖辈起就日渐衰微。他祖父吴旦是监生，做过州同知。父亲吴霖起是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父宦游。二十三岁那年，父亲去世。由于他不顾身份贵贱，广泛交接各色人物，“性耽挥霍”，不能“光耀门第”，甚至连“祖业”也安守不了，所以宗族长辈兄弟歧视他、唾骂他，并趁机侵夺他的家产。没有几年，他的奴仆逃散，田地卖光，乡里豪绅把他“传为子弟戒”（《文木山房集·减字木兰花》），亲友故交或拒之门外，或避于路途。于是，他怀着“逝将去汝”

《文木山房集·移家赋》的忿懣，移家南京。从此，生活更加贫困，有时卖书换米，有时“闭门种菜，僱佣保杂作”（顾云：《钵山志》卷四）。他常于严冬的夜晚，邀集朋友，绕城步行几十里，以此取暖，谓之“暖足”（程晋芳：《文木先生传》）。晚年，吴敬梓的生活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五十四岁那年，客死在扬州。

吴敬梓从小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教育，父辈希望他从八股科举的“正途”出身，但他偏偏在被鄙视为“杂学”的诗赋词章上下功夫。他二十三岁考上秀才（此据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和作》），二十九岁到滁州参加科考，遭到斥逐，此后再没有参加八股考试，并且提出了“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见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引）的怀疑。移居南京后，更蔑视礼法，认为受程朱理学束缚，是懦弱和固陋的表现。他效法晋代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文木山房集·买跛塘》），愤世嫉俗；甚至向“昧三从之古训”，从夫家逃到南京的葺城女士表示敬意（见程廷祚《青溪文集续编·与吴敏轩书》）。对于八股文士，他嫉之如仇，对愈是做得精巧的，愈是痛恨。三十六岁那年，安徽巡抚荐举他去北京参加“博学鸿词”廷试，他托病拒绝，用行动对科举制度作出否定。乾隆到江南，士大夫都去夹道迎拜，他却“企脚高卧向棚床”（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表示对封建帝王的蔑视。吴敬梓的上述生活经历和思想表现，与《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和形象描绘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过程中，吴敬梓饱尝了本阶级的世态炎凉，接触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看到了社会上

的种种黑暗现象，由愤怒不平进而讽刺抨击。他从四十岁左右开始，花了近十年时间，创作了《儒林外史》，以文艺为武器，加入了反理学、反科举的战斗行列。晚年，他“好治经”，用经学新解等曲折、隐蔽的方式进行反理学斗争。吴敬梓的著作，除《儒林外史》外，主要有《诗说》（已佚）和《文木山房集》（现存四卷）。解放后还发现了他的《金陵景物图诗》。

“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程晋芳：《怀人诗》）批判八股科举制度，揭露反动儒生的种种丑态，是《儒林外史》突出的思想内容。

《儒林外史》第一回就提出了科举问题。作者通过他刻画的理想人物王冕之口说，八股取士制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一代文人有一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作品展开了广阔的画面，具体地、生动地揭示了八股取士制度的反动和腐朽。

“学而优则仕”是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科举考试则是“学而优则仕”的法律化、制度化。封建统治者推行八股制义，把读书和升官发财直接联系起来，借以禁锢进步思想，刺激封建知识分子的贪欲，把他们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枷锁之中；并从中选取驯顺的统治爪牙，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正是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儒生们醉心举业，荒谬地认为：“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小说中的八股文选家马纯上，就其品行来说，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卑劣的程度，但他毫无讳饰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人生世上，除了这事（举业），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这段话，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儒生们的精神境界。

周进和范进是“学而优则仕”信奉者的生动形象。他们在举业的道路上，洋相出尽，丑态毕露。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周进，到了贡院，触景生情，竟“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救醒以后，还“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几个商人凑钱给他捐个监生，他就爬在地下磕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穷秀才范进，突然看到中举的喜报，顿时喜欢得痰迷心窍，发了疯。为什么周进和范进如此神魂颠倒？因为科举考试是向上爬的阶梯，考上了举人、进士，就可以升官发财，取得封建统治的特权。请看，周进和范进中举以后，田产、房屋、奴仆和钱米，就有人送上门来；曾经将周进辞馆的薛家集的乡绅，立即为他竖起长生禄位牌；随意唾骂范进的胡屠户，霎时就称他为“老爷”“贤婿”。不久，他们就穿上“螺螄结底的靴”，当上了擅作威福的封建官僚。

“学而优则仕”是一剂腐蚀灵魂的毒药，匡超人的蜕化变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匡超人出身贫苦，原是备受摧残折磨的纯朴青年；但是，听了马纯上举业第一、做官第一的一番指点后，思想就起了变化。他在杀猪、磨豆腐、做小生意过日子的同时，天天夜里读八股文，渴望以此“荣身”。进了学，又深受景兰江等“名士”的熏陶，衙吏潘三的教唆，终于自甘堕落，任什么卑劣的勾当都能干出来，成了封建统治者的帮凶。

《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形象告诉我们：在明、清时代，所谓“学”，就是程朱理学、八股选本；所谓“优”，就是烂熟地背诵孔孟和程朱的反动教条，据以编制又臭又滥、空洞无物的八股文

章。作者还进而揭露，所谓“学”和“优”，实际上已经成为营私舞弊的代名词。请看，在科举考场中，或则请人代笔，或则夹带入场，丢纸团，掠砖头，贿赂收买，尔虞我诈，不一而足。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性和腐朽性；说明了科举考试不过是争名夺利、光怪陆离的丑剧。

《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揭露是和对程朱理学的批判结合起来的。它通过马纯上关于各个朝代有不同“举业”的话，点明了当时的科举考试是和程朱理学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的。儒生们愈是热衷科举考试，就愈加受到程朱理学的毒害。小说以批判科举制度为线索，进而揭露了程朱理学、封建伦理道德的残酷和虚伪。

《儒林外史》中的科场举子，都拜倒在程朱的脚下，把八股制义当作安身立命的灵丹妙药。象进士出身的鲁翰林，就将程朱理学和八股文捧上了天，而把一切学问都斥之为“野狐禅”。他女儿鲁小姐也废寝忘食，拚命读经，当发现丈夫对八股文“不甚在行”时，竟痛哭流涕地说：“岂不误我终身。”后来，她寄希望于儿子，每天抱着四岁的孩子，讲《四书》，读八股，通宵达旦，夜以继日。这些描写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八股取士制度推行程朱理学的罪恶。

《儒林外史》通过正面人物杜少卿等，公开否定朱熹解经的独尊地位。认为讲解经书“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杜少卿撰写《诗说》，针锋相对地批判朱熹的谬论。他蔑视科举，“不欢喜人家说要出来考”；甚至直斥钻营功名的臧荼：“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他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妻子一起

上酒馆，携手游清凉山。同情敢于冲破礼教堤防的沈琼枝，对她表示敬意。他反对纳妾，反对风水迷信，轻视功名富贵，认为举人、进士等儒林中的佼佼者，其思想品德远远不及市井中的普通老百姓。这些描写，有力地抨击了作为封建末世精神支柱的程朱理学，同时也说明吴敬梓具有一定程度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

沈琼枝的形象很值得注意。盐商宋为富用欺骗手段要娶她为妾，她毅然逃离宋家。虽然受到迫害，却勇于反抗，并不屈服。盐商的富贵豪华，她“视如土芥”。到了南京，自食其力，以卖诗文和刺绣为生。她怒斥流氓，蔑视衙役，在极端歧视妇女的恶浊环境中，傲然挺立。这些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在当时反封建礼教的斗争中，社会上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正在萌发滋生。

吴敬梓以辛辣的笔墨，深刻揭露了那些满口“诗云”“子曰”的孔孟之徒，其实都是蝇营狗苟的伪君子。道貌岸然的高翰林赤裸裸地说：“敦孝弟，劝农桑”，“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不能当真。被誉为“居丧尽礼”的举人范进，守孝期间就跑出去打秋风。他在喝酒前装腔作势，不肯用银镶筷子和象牙筷子。可是刚开始吃，就迫不及待地“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因为“优行”而被荐举为贡生的严大位，明知弟弟死了，却要等弟媳妇送过二百两银子，才“戴孝”过去，在柩前“干号了几声”。不久，又想方设法去夺取弟媳妇的家产。这些滚瓜烂熟地背诵孔孟教条的儒生们的卑劣行径，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精神上的彻底破产，同时也证明了孔孟

之道既反动又虚伪的本质。

当然，在封建末世，也还有少数儒生是深信封建教条的，作品中的王玉辉便是如此。王玉辉是个秀才，读了几十年程朱理学，结果越读越蠢，“越老越呆”。他赞扬和怂恿三女儿绝食殉夫，认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三女儿死了，竟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这是一幅“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形象图画，它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礼教确实就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沿着科举考试、读书做官的多级阶梯，《儒林外史》比较广泛地描写了儒生的活动，揭露了封建末世某些腐朽黑暗的社会现象。从批判科举出身的官僚入手，吴敬梓的笔锋指向当时的官场，抨击了腐败的吏治。例如，昏庸愚蠢的知县汤奉，一年就要搜刮八千两银子；为了沽名钓誉，竟枷死回民老师夫。南昌太守王惠，刚上任就询问：“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他的衙门里响彻了“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万里冒充中书行骗，露了马脚，结果，花钱买了个真中书，假戏真唱，不输官司。至于威胁王冕的翟买办，敲榨马纯上的差役，把持官府、包揽词讼的潘三等等，更是等而下之的赤裸裸榨取。耐人寻味的是，象王惠这样的贪官污吏，竟被誉为“江西第一个能员”，屡次升迁。而青枫城“立功”的萧云仙，野羊塘“奏凯”的汤镇台，却遭到弹劾和贬斥。抚院委向鼎到宁国府去摘印，向鼎却以为祸及自己，“满衙门的人都慌了”。这些描写揭露了整个封建官僚机构，从上到下贪酷成性，昏庸糊涂，朝不保夕，反映出雍正、乾隆年间政治的极度

腐败。

科举制度还造成了大批土豪劣绅。因为儒生们取得了举人、贡生等头衔，就有了结交官府，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资本。象严大位，他不过是个贡生，就肆无忌惮，无恶不作：公开拦人的猪，讹人的钱，强占寡妇财产，白赖船家力资。五河县方家中了两个进士，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至“方府上田主子下乡要庄户备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官僚和豪绅勾结在一起，把广大劳动人民踩在脚下，《儒林外史》中写到京城附近一对老夫妻贫困而死，死后无人收尸埋葬；常熟县佃农被地主斛去了全部稻谷而被逼投河自杀，就是这种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真实反映。有压迫就有反抗，小说中所写赵大夺饷银，木耐劫路，回民罢市，扬子江上农民组织起来抢盐等情节，已透露出封建末世人民大众和反动统治者行将展开大搏斗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音信。

在《儒林外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能由科举阶梯爬进官场的，毕竟只占少数。大量科场失意的读书人，有的潦倒终生，卖儿卖女，如倪霜峰，他从二十岁进学，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结果“拿不得轻，负不的重！一日穷似一日”。还有的假托无意功名，冒充风雅，标榜清高，成为专门扯谎帮闲的“名士”。作者对前者的遭遇，寄予充分的同情和怜悯；对后者的丑态，则加以凌厉尖刻的抨击，从而构成了作品揭露当时恶浊腐败的社会风气的另一重要方面。

科举出身的官僚和“名士”，是八股取士制度这根黑藤上孪生的毒瓜，有科举出身的官僚就有“名士”。作者通过对牛

浦郎等形象的描绘，入木三分地剖析了“名士”仰慕官僚的卑劣心理。当牛浦郎偷到牛布衣的诗稿时，看到题目上的相国、督学等字样后，“自想：这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这段精彩的描写，深刻说明“名士”之“名”，不过是用以投靠权豪的资本而已。

《儒林外史》中的“名士”，有的是官僚子弟，如娄相府的公子、蘧太守的孙子以及杜慎卿等；有的是江湖骗子，如杨执中、权勿用、赵雪斋、牛玉圃等；有的是市井光棍，如景兰江、支剑峰等。流风所及，连冒名顶替的牛浦郎，手头有剥削来的几百两臭银子的土财主诸葛天申，都无不钻头觅缝、如蚁附膻，打起了“名士”的招牌。作品通过莺脰湖雅集、西湖宴集、莫愁湖高会等三次“名士”聚会的集中描写，以及其他分散的漫画式的勾勒，暴露了他们自命风流、帮闲帮凶和招摇撞骗的种种丑态。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儒林外史》象一幅生动画卷，展现了一幕幕封建末世群魔乱舞的丑剧，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已经“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行将彻底崩溃！

作为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仅见的。鲁迅在谈到讽刺作品的特点时指出：“‘讽刺’的生

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儒林外史》中的人和事，在封建社会末期是习见为常，广泛存在的。吴敬梓通过集中概括，典型地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揭示了它们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同上）比如，胡三公子主持西湖宴集时，去买鸭子，拔下耳挖戳戳脯子上的肉厚不厚，三个钱的馒头只肯出两个钱，吃喝完了，还“取了食盒，把剩下来的骨头骨脑和些果子装在里面”挑回家去。这些描写，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贪婪成性、一钱如命的阶级特点。为了揭示事物的本质，有时作者也进行适当的夸张。如严大育临死时，因油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咽气。作者还非常注意刻划人物和事件的不同特点，突出人物的个性。例如匡超人和牛浦郎都吹牛成性，但匡超人吹嘘内廷教习的威风，是任意夸大；牛浦郎讲自己骑毛驴见董老爷，则是毫无根据的编排。前者老奸巨猾，后者无知可笑。吴敬梓的讽刺艺术可贵处不在于不是玩世不恭的游戏笔墨，而是严肃认真的对现实的鞭笞，因而能够通过充满虚伪矫情、热衷功名利禄的儒生的讽刺，构成了对整个黑暗社会的揭露，从而使作品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性。

“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儒林外史》的强烈的讽刺效果，并不是靠作者的议论取得的，而是通过巧妙的构思和犀利的解剖取得的。作者善于把矛盾着的事物同时表现在一个人身上，让他当场出丑。正当严大位夸耀自己从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的时候，一个小厮来说，人家来讨被他早上

关的那口猪了。周进是童生的时候，秀才梅玖对他百般嘲笑、奚落；而当他做了国子监司业后，梅玖就冒充他的学生，恭恭敬敬去拜他的长生禄位牌了。王德、王仁满口“在纲常上做工夫”，心里想的、眼睛盯的其实是银子；严大育只用了二百五十两银子，就使他们改变了态度，由“脸本丧着，不则一声”一变而为“义形于色”，欣然同意他把小老婆“扶正”。通过这些淋漓尽致描写，剔肤见骨地揭露了儒生们内心的丑恶。

《儒林外史》结构的特点是：“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它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而是围绕主题思想，把不同的人物和故事联缀成篇。例如，围绕反科举，它先集中几回写周进和范进，揭露热衷科举的读书人的丑态；接着写张静斋、严贡生，反映以科举功名为护身符的土豪劣绅的专横。写王惠的几回，则说明科举选拔的官吏是残害百姓的刽子手。作者常用一二个人物的活动，使各个“短篇”勾连起来，如王惠的出场由周进接引，严贡生由范进带出。前面出现的人物，后面也通过其它人物加以补叙。如第三十八回交代王惠的下落，五十四回说明权勿用的结局。这种结构，有利于在广阔的画面，通过对各种人物和事件的描绘，揭露儒林的种种丑恶现象。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出色的。吴敬梓把全椒、扬州、南京一带的群众语言进行加工提炼，在这个基础上，又应用了一部分文言词语和职业行话。书中人物的言语总是和他们的性格、身分、职业相吻合。例如，“子曰行”的马纯上开口不离“举业”、

“做官”；选家卫体善唠叨的是“文章法则”；在差人役吏的口里，则往往使用谚语和歇后语，与封建士大夫文绉绉的言语迥然不同。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能如此鲜明生动，剖析人物精神面貌能如此淋漓尽致，是和作者高度的语言艺术技巧密切不可分的。

我们说《儒林外史》具有鲜明的反儒倾向，对当时的儒林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但这并不是说作者已经认识到整个儒家教条的反动性和虚伪性，从根本上自觉地加以反对了。鲁迅先生说得好，吴敬梓“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中国小说史略》）。正因为他对孔孟之道“能心有依违”，也就是能从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出发，对孔孟之道的某些方面采取否定或批判的态度，才使他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具有反儒倾向的作品。但是，他毕竟“束身名教之内”，所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认清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并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他唾弃鞭挞的分明是当时社会里到处充斥的实实在在的“真儒生”，却又根据自己头脑中理想化了的儒学，心造虚拟出几个人物，名之曰“真儒”，加以称美、表扬。反对实际生活中存在着的儒，而向往实际生活中不存在的“儒”，正好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的深刻矛盾。

由于吴敬梓终究还是“名教”之中的人，由于当时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的阶级还处在萌芽状态，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使他始终看不到改变这万恶儒林乃至整个恶浊社会的真正出路，他的正面理想也摆脱不开传统的儒家道德说